

从民俗看献礼片 ——以《建国大业》为例

李良嘉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吉首, 427000)

摘要: 献礼大片电影是一种特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此种电影与当前体制与社会有着莫大的关系, 对于当代公共生活的构建更是意义重大。文章讨论了当代献礼片电影作为一种现象和当代体制下的社会组织民俗问题, 并着重以献礼大片电影《建国大业》为案例, 折射当前社会体制内的群体行为、世风民俗、习性乃至国民性的问题, 同时也简要回顾了过去电影中民俗题材的表现与样本价值。

关键词: 献礼片电影; 社会组织民俗; 《建国大业》; 电影春晚化

中图分类号: J9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1-0177-05

观影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社会活动。献礼大片电影作为一种现象, 对于当代公共生活、空间的构建意义重大。因为献礼, 更因为商业、市场、大片的缘故, 此种电影与当前体制与社会有着很大的关系。国家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上的有意识建构也影响着民间层面的观念, 新民风、新民俗依此而立。

民俗,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生活。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 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 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有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间观念等。献礼片电影, 无疑是出现在岁时节日时期的, 且多是关于国家庆典和纪念, 又具备官方组织形态的意义, 承担着倡导宣扬主旋律和政治宣教的使命。以《开国大典》(1989, 建国40年庆)、《开天辟地》(1991, 建党70年庆)、《七七事变》(1995, 抗战胜利50年庆)、《国歌》(1999, 建国50年庆)、《建国大业》(2009, 建国, 政治协商会议60年庆)为代表。

献礼大片电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 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主旋律电影来解释和定义。单从小平同志所说的“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电影”来看, 献礼大片电影早已超出了从前的主旋律电影定义范围了。献礼大片电影在主旋律的建构层面上, 符合以下定义: 主流意识形态认可, 国家政策倡导, 主导文化价

值观。

电影《建国大业》从主旋律意识形态下的受众心理到革命历史折射下的当代时事, 无不与当下民风民俗有莫大关系, 或者干脆在建构新民俗解构旧民俗。本文主要讨论当代献礼片电影作为一种现象和当代体制下的社会组织民俗问题。着重以献礼大片电影《建国大业》为案例, 折射当前社会体制内的群体行为乃至社会风俗、习性乃至国民性的问题。

一、人类学意义上的电影和旧民俗

关于电影与民俗问题, 清华大学尹鸿老师讲过: “这批电影还有第二个特点, 就是民俗化的特点。那么类似这样的场面, 这些电影当中非常之多, 这也是西方人所不熟悉的中国仪式, 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一些奇观化的一些民俗。”^[1]他所讲的这些电影中西方人所不熟悉的中国仪式, 文化, 以及奇观化的民俗, 多源于第五代导演所拍的《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之类电影, 主要是民俗中的旧民俗部分。所反映的故事年代大多已经久远, 应该称作是与封建专制落后有关的年代, 有关于旧社会的社会体制, 归于旧民俗一类应该比较合适。这些在如今多数已不再鲜活的民俗, 不仅是西方人, 即使是中国人, 也会觉得

收稿日期: 2011-11-09; 修回日期: 2012-01-04

作者简介: 李良嘉(1977-), 男, 湖南涟源人,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电影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文学, 电影文学理论。

是奇观,甚至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外国人经常买这一类的电影,据说是开展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资料。

反映旧民俗的电影,真实地反映了偏隅某地(如大西北)的民俗民风,在最初面世的时候,因为文化差异,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叙事以及更多的电影表现技巧,文化奇观的初次冲击边际效应就会递减和消退。一些导演在拍电影时越来越倾向于将故事情节与电影民俗纪录截然分开,甚至用民俗片段来代替叙事,追求纯粹视觉上的奇观,不仅没有让民俗和叙事自然融合,而且使民俗传统失去了情节与整体叙事的支撑,显得苍白,传统历史的现代化思考和比较无从谈起。

大量民俗影片的某些片段如同标本般,只具备文献意义,主要的用途是成为艺术资料的剪辑编辑对象。当电影观众的窥探欲望被满足了以后,对于奇观文化、迥异的民俗就不再那么迷恋和喜爱。近年来,来自神秘东方国家(诸如伊朗、中国、印度)的民俗电影可以获得世界级的电影奖项,却难以真正在商业和娱乐领域获得真正和长久的成功。简单说这些电影拍摄的目的,是投西方人所好,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还应当说这些电影纪录了民俗民风,而使它们有了类似文化遗产般的观赏甚至收藏价值,而跻身艺术精品行列。虽然我国这些电影也随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而更加耀眼于世界,但国外(西方)观众对此的态度终究只是猎奇玩赏性质和收藏性质,难以掀起电影世界的新浪潮。

20世纪中国早期电影,对于世风民俗多有表现。尤其是对于现代文明的奇观,如火车、机器、烟囱、轮船等等。对于西方文明,也是心有艳羡,总是希望在电影里开展新生活新文化运动,进行移风易俗式的社会革新。如《女儿经》(1934)就是这样一部宣传新女性新生活运动的电影,其主导的新思想新生活方式,几乎成为当时民国政府黄金十年的主旋律。

惯用民俗和民间文化来传承古老深邃情感的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表现的旧民俗,是旧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下的民俗,是和官本位、奴役、人性不张分不开的民俗。近年他的影片叙事不再流畅,民俗电影也不再风光。究其原因,之前的影片多源自成型小说,文本改编成功。过去的电影中的民俗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多少承担着叙事功能,但现在很弱了。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表现,是民俗的又

一次集合和对文化传统的融汇,与叙事和情节无太多关系,目的是文明展示和与世界接轨,是用来为重大命题和宏观叙事献礼。如果理解成另一种类型的献礼(片),也未尝不可。献礼的范围已不仅是“领导满意”和“群众满意”了,其取悦的观众已不限于一国一地。过去的民俗,常常被宗教、祭祀、仪礼、皇权神化等实体化的活动影响,通过对日常生活规范、规整的形式来引领民俗民风。今日的世情民风,多通过和影像视听媒介合作的形式,引领规整的形式更加抽象化;通常是以重大仪式活动(运动会、纪念日、节庆集会、辩论选举等)为社会组织动员形式,以影像奇观化为具体呈现手段,构建虚拟的社会公共空间;引领受众在万能的银幕荧屏等视听媒介前,被动接受提供的观念,进而影响日常生活,形成日常观念和习俗。

二、新时代与献礼片电影下的社会组织民俗

主旋律电影,有关于当代社会体制下的民风民俗。这与钟敬文先生《民俗学概论》书中提到的“社会组织民俗”概念相近。钟先生讲的“社会组织民俗”是“人们在建立并沿袭群体内的互动关系,以推动群体世界的时候所形成的习俗惯制”。^[2]献礼片不是样板戏,其体制内的艺术创作和主旋律下的创新,使得时代特征异常明显。本文讲的民俗更多偏重献礼片所折射的当前社会体制内的习惯性行为乃至社会风俗、习性乃至国民性问题。因其鲜明的体制特征,既要保证政治正确下主旋律命题,还要兼顾商业化市场化,因而对反映时代风气极具代表性。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治正确”与“商业性且市场化”的双重命题极为吻合。

《建国大业》作为经典,是我们认识当下社会组织风俗的好典型,其表现了悠久的中国传统,醇正的中国特色民俗,尤其是与当下政治体制息息相关的社会组织民俗,作为新民俗和社会组织民俗电影的代表是非常鲜活的材料,其本身就是一种民俗,与其姊妹篇《建党伟业》一样是我们认识当下社会组织风俗的好典型。献礼片通常是气势恢宏、催人奋进和主旋律的。其内容与风格与新中国革命题材电影相似,继承了大量标志性的特点,如正面人物的高大全,反面人物的猥琐与丑陋,敌我斗争两条主线,两个阶级的生死斗争。但献礼片毕竟不是样板戏,其艺术性、商业

号召力、对市场的适存，已经远远超越前面的时代。同时，体制内的艺术创作和主旋律下的创新，其时代特征也异常明显。

（一）宏观层面的社会组织(新)民俗——主流体制和主流社会程式

1. 主流社会程式与风俗

体制与民俗是如此的紧密，主流体制和主流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程式，即使是在文艺娱乐传播传媒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程式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种有关权力分配的秩序意味着准则，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层面(体制层面)的民俗影响着人们的共同心理，乃至形成民族性。体制内的主旋律电影正好为我们的民风民俗立此存照。今天的献礼片电影正是体制下的产物。

春晚毫无疑问是新民俗的。献礼大片电影和春晚和新闻联播等等体制下的娱乐(或节目)形式，比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其近几十年的一贯历史传统，对民众心理、生活习惯、娱乐方式、产业的重大影响。春晚作为一种文娱方式，是体制内的一个庞然大物，与体制的纠葛实在复杂，其本身也发展成了一种传统和民俗。主流的体制和主流社会程式在春晚和献礼大片电影里表现无遗，将两者比较更有助于理解我们体制下的新风俗。

无论是春晚还是献礼片，如何安排演员出场顺序，正如安排领导排位坐席般慎重和庄严肃穆。角色大小，都代表着背后各种力量的竞争。竞争力量可能代表省市地域，也可能代表着民族身份，工农兵商学各个阶层，甚至民工弱势群体。种种安排无不体现中国特色的政治和现实。其实春晚的本质，从其定期制作，从其庆典仪式属性等来看，不也是体制内一种献礼(片)形式吗？由此可引发关联和对接的是，传统中国之“守礼”和“不逾矩”。

2. 政治协商与社会秩序

《建国大业》这部全景式的反映建国协商议政的电影，有如一台大春晚，各路明星纷纷到场，各个民族代表面面俱到。献礼片，无非也是老明星演员，绯闻炒作花絮满天飞。老故事，新讲法，再不行就换上新面孔，再演绎一遍我们心中早已熟悉的革命故事和历程。因此也难免像春晚一样，明星出场时间很短，仅限于歌曲联唱，人均几句台词或歌词。实在没词的就什么也不说，出来拜个年、露个脸。有如央视的新闻联播，建国大业的主旋律模式也是演艺圈的两岸三地的政治协商制，是各路娱乐势力的政治协商大会，

是CCTV下的新闻联播。各路明星人士鱼贯出场，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另一场春晚。借建国60年的东风，政治协商会议60年的东风，两岸三地演艺圈也就此电影大会团圆，与主流的时代共存共荣共和谐。电影中的社会秩序和电影外的社会秩序都是一体存在和互相支撑的。

3. 政治正确

在艺术创造和自由发挥上，春晚和献礼片自然不会有惊天动地的表现，有的只是中规中矩的和谐与讲政治。献礼片、春晚、新闻联播当然都是要做到全面周到和政治正确，因此在风格上也是严谨和安全的。电影和春晚都同属娱乐，艺术的技巧开始让位于政治平衡的技巧。历史因此表现得也不再那么沉重，娱乐性益强，而叙事变弱和难以流畅。叙事母题方面，始终还是敌我双方各表一枝，革命艰难地在最后胜利。至于说革命胜利后如何将革命理想变为现实的艰难历程就避而不谈了。有如娜拉出走，是关键的一步，但娜拉出走以后又如何呢？革命的胜利后又如何建国，如何实现革命目标，兑现理想？都无法看到电影演绎。革命史诗的电影绝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小品化的。但受娱乐教育多年的观众似乎并不计较这些。从前的政治宣教真的是远去了，较真的电影艺术依然在路上。如果文化历史艺术都被快餐着，电影这个综合艺术又能怎么样？一个快餐的时代，精神被娱乐外壳包装和掏空的时代。

（二）微观层面的新民俗——日常生活民俗

看春晚，引用春晚小品里的段子在一年四季与朋友开玩笑调侃，以示与时俱进且时尚；等待下一年新春晚的老演员的新段子；甚至春节前猜节目和演员，春节后初一初二由想出头的小愤青开骂，都成了新时代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都已经常规化和仪式化了。春晚如此，献礼片电影又何尝不是如此？没开拍没上映的时候媒体疯狂造势，猜演员猜节目，猜老赵小沈阳到底上不上，怎么上，上什么。专家和愤青一边看热闹一边等着片子拍好上映，一边拣砖头准备拍。媒体一边造势一边自然有各路人士拿着软文论文准备吹捧，愤青们一看完盗版碟盗播视屏后就马上将砖头飞的满天都是。真相只有一个，电影票房成功，政治正确，愤青在网上和次级媒体闹事也仅仅是口水仗。台下愤青的砖头从来砸不死人，台上总是热情洋溢和成功闭幕，其核心理念其实还是“娱乐至死”和“不犯错误”。

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各自表达，这就是今日社

会。体制内的社会组织民俗是何其有趣!这已不仅是文艺娱乐行业的自我传统,还影响了传媒宣教的行为模式,对于观众,亦是一种改变。艺术的自我创作,娱乐的内心自我表达,甚至艺术的享受,自此也日益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正确的商业活动。主旋律意识形态与民间表达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享受和消费各自的媒体和信息。

三、叙事与受众

如何给观众讲解革命故事是主旋律献礼片永恒的主题,这并不妨碍故事讲述的多样性。尽管直面历史、还原历史实在太难,但小品化的故事是一种有悠久传统的电影春秋笔法。我们生活的当下,是个充满着爆炸式新闻、各种段子、小品的世界;特征是简短有力没有下文,雷人有噱头不发人深省。《建国大业》电影中的数不清的明星难免在空间时间受限,为了出彩赢得出境效果,某些演员的出场也就充满了戏剧效果,以至于无法在艺术上形成完整的叙事链条。电影作者和观众是如何在内在心理机制上达成一致的?

(一) 电影叙事的小品化

春晚带动社会潮流的能力至少是献礼片电影的若干倍。只是小品化的情节实在是一种有悠久传统的电影春秋笔法,这种春秋笔法所营造的视觉奇观,客观上造成了电影具有更多观赏性和娱乐效果。如《建国大业》中王宝强所演的战士面对北平城墙误以为是地主家的大宅子炮都轰不开的段子,和范伟厨师出场的快速和突兀,充满着喜剧和笑话色彩,使故事叙事显得处处有如小品包袱段子的精彩,观众的注意力一再被分散到各类大腕小腕身上和他们鱼贯而入的快速出彩表演上。明星个个都光芒四射,神态风格却缭乱分散而难以统一,再也找不出从前革命题材电影里发出的那种自觉的紧张严肃高度统一的革命情绪。叙事小品段子化,情节和故事性被削弱。每个人物都是那么认真紧张敬业,有如出演短剧小品,而不是再现历史真实。再也看不到平静自然的叙事,举重若轻的内心与情感,就如个个节目都是精品、短而抢镜、却个个节目都平凡的春晚结局。

妇女同志最终决定国旗的样式,是剧中小品,确实很有趣和有新意,却终究无法演绎革命真理。无论是五大常委喝酒失态唱歌庆祝胜利,还是毛主席踢翻脚盆及冷静自我克制的周总理失控大发脾气,这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认真的历史叙事,而更像是小品小

故事,是片段。傅作义将军在电影中,其思想立场犹如戏剧般突变,转向太过迅速,愿为毛主席执鞭坠镫的故事也过于简单直白。大好英雄人物,何不多着笔墨?北平的历史保存者不受历史影像的眷顾,却只能被历史铁闸化,小品化叙事。

(二) 观影与接受

受众对于献礼片的历史掌故已经无比熟悉,无需带上中国革命史教科书也能保证看懂,他们是属于心理内在机制比较接近主旋律的人。电影中大小会议三十余次,近于碎片化的叙事也不能使他们离场。即便导演让影片内容纵横捭阖,非连续非线性叙事,也足以使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观众自然产生共鸣,达到观影的内在心理机制和外在美学的统一。对于献礼片,电影观众似乎很理解,似乎更宽容其叙事的艺术性。电影的艺术审美标准因为献礼片而产生多样性和包容。

(三) 国家庆典和民众的盛宴

献礼片电影是一场国家庆典与民众的盛宴。从共同心理角度看,电影的目标观众群体也是很有民俗特色的。长期以来,此类影片主要以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为主要消费群体。其观影资金多属于公共经费,诸如工会费,公款之类;观影的组织方式也是团体观影,其受众自然也是体制内代表主流的和较为认同体制的群众。从构建当代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国家庆典和民众在心理方面应该是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可认为至少是和谐的。共同心理是民俗形成的重要标志,受共同心理影响,民众在行为方面会有趋同现象并产生价值趋同,进而形成某种下意识,甚至思想、心理方面形成约定俗成的一致。

四、历史传统与时代新意

献礼片承载着教育群众、政治宣教的功能。在商业化市场化背景下,献礼片依然要做到讲政治、讲正气,把握好主旋律,确实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一) 历史教科书的改进和寻唤

国内电影观众对于中国革命史,在知识层面上,早已有了成熟稳定的理解,甚至是历史洁癖。既然大方向不能变,那就拿些小故事、小品式的片段来敲敲打打吧。这种小敲小打似乎带来另一个好处,就是通过献礼片的不断积累,人们在不断的看到这种革命叙事趋同的献礼片后,牢固的打下了中国革命史的框架

基础，对于伟人们的形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任务形成了共识。每个献礼周期不断补充新的革命史学新发现和成果。这种历史政治教育模式和寻唤机制的相对稳定，使得历史教科书式的献礼片的表现模式也会相对稳定，变的只是外在包装。从清华尹鸿老师的《主流价值、商业诉求、电影产业——关于主流商业大片的对话》一文中可以看到，这种模式会稳定下去，还有很多大业伟业在银幕上待完成。世风民情在此模式下的生态是可以想见的。

(二) 统一的国家梦想

从中国电影民族美学的“国家梦想”和“家国梦想”概念出发，也可发现这个主题是如此的鲜明于中国历史，以至于我们无处回避。回望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天下”和“一统”更是文人墨客念兹在兹的主题，无数次以此为口号和旗帜来影响民族的心理及日常行为。

从银幕上来看，电影对人物的塑造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脸谱化。曾经的大反角，蒋介石，虽一如既往的狼狈和不堪，但终于不再那么软弱和灰暗。随着两岸关系改善、台资的涌入和两岸经贸关系的紧密，蒋经国当年在上海滩打苍蝇不打老虎、试图挽救国民党大陆败局的故事，也不完全是那么荒唐可笑了。民俗民

风是可以变迁和受社会风物影响的，曾经的坏人脸谱如果以更大的政治正确(统一)来重新思考，蒋家父子多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五、结语

体制下的献礼片电影，可以挖掘的题材和领域比较少，在政治正确的要求下，还原真实的动因，不应仅是源自统一的需要和经合的推动，更应是源于历史本身真实的自我发现。献礼片电影的中国特色，说是现象也罢，说是当下民风民俗也罢，与体制是毛与皮的关系。民俗有新有旧，无非是新旧社会与体制的写照。献礼片这一独特的当代电影艺术形式，具备了许多体制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与其说是献礼片，不如说它是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 [1] 尹鸿. 尹鸿谈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 北京: 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2004.
- [2]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118.

From Customs to Thanksgiving Film: A case study of “The Great Cause of China's Foundation”

LI Liangjia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27000, China)

Abstract: Thanksgiving Film is a Chinese cultural phenomenon, a kind of special film with strong flavors of Chinese society, which are closely combined with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he today's Public Life Building. My paper focus on Thanksgiving Films, especially the new film “The Great Cause of China's Foundation”, and take them as mirror of China's culture, social customs, and the customs of social organs, to reflect the people's behavior, public morals,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ecalling the historical video texts of thanksgiving, in which we can find the tradition and customs of old China and new China.

Key Words: Thanksgiving Film; Customs of social organs; “The Great Cause of China's Foundation”; Film of Spring TV Festival

[编辑：胡兴华]